

城市化模式选择与我国“三农”问题

齐红倩

(吉林大学 商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农民收入严重偏低、城乡收入差别过大是我国“三农”问题的突出表现。实现全面小康和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彻底解决“三农”问题。通过对我国“三农”问题的本质解析,指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大量减少农民数量,实施城市化战略。农村城市化不但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也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必然过程和选择。

【关键词】城市化;“三农”问题;小康社会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129X(2006)02-0024-06

【Abstract】 Acute low income of farmers and big difference of income between city and countryside are obvious manifestation of AFC issues in our country. For building moderately and harmonious society, we must solve the problems of A F C thoroughly. This article has analyzed the nature of A F C problems and pointed out that the key how to solve A F C problems is reducing the quantity of farmer in a large number and carry out the strategy of Urbanization. Urbanization is not only the key of AFC problems, but also it is a consequential process and choice for building moderately and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 urbanization; AFC problems; moderately society

我国近 20 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经济的持续增长不但解决了亿万人民的温饱问题,而且促使越来越多的城乡居民步入了富裕阶层行列。但我国的经济增长并不均衡,80 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使农民收入有了一定的增加,国家允许农民进城打工,每年有几千亿元的收入返回农村,这使农民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在这段时间内城乡收入差距曾一度拉近,但这种现象并没有持续多久,城乡收入差距就又扩大起来,城市居民收入增长迅速,农民收入却停滞不前。目前我国“三农”问题突出体现在农民收入严重偏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别过大、农民生活质量不高等方面,已经严重地阻碍了我国建设全面小康和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

我国经济发展目标是走可持续均衡发展的道

路,应确保更多的公民特别是在经济腾飞过程中掉队的农民分享我国经济迅速增长的成果。如果不把我国贫困的农民变成消费者,我国整体的消费需求就不会旺盛,供过于求的局面仍将无法改变,经济就无法呈现长期稳定的增长。因此,“三农”问题不但是我国向现代化过渡和稳步发展不可逾越的重大问题,也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必须加以解决的社会改造和发展问题。

一、我国“三农”问题及本质解析

农业问题历来是国家的首要问题。我国在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长期实行向工业过渡倾斜和城乡隔离政策,使农村产业结构单一,大量剩余劳动力没有出路,再加上我国一直存在的人均占有土地数量少、农产品市场竞争乏力等原因,

[收稿日期] 2005-08-29

[基金项目] 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吉林省全面小康与城市化建设实证研究(2004013)

[作者简介] 齐红倩(1962-),女,山东武城人,吉林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数量经济。

导致我国城乡收入差别悬殊。

(一) 城乡收入差别悬殊导致我国“三农”问题难以解决

1996年以来,我国农业增长率呈下降趋势。与此相关,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也呈下降趋势,2002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只能勉强相当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993年的水平(参见表1)。目前,我国城市人口的年平均收入大约为7700元,同时城市居民实际还可获得各种“文明生活”的补贴以及得到一些福利补助(如:住房补贴、医疗保险、社会

保险等),而农村人口的年平均收入最多也就是2400元,并且农民纯收入中的相当一部分还要用于购买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实际上农民真正能够用于其生活消费的达不到65%。从绝对收入上看,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还要大得更多,城乡居民之间的差距甚至达到了1:6。因此,虽然经济增长增加了一般家庭的收入,但不平等的增长使农村大多数家庭并没有完全分享到经济繁荣带来的实惠。

城乡收入分配不均严重制约了我国的消费水平 and 经济增长质量。我国有9亿农村人口,城市

表1 1985—2002年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元)

年份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1)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	(2)/(1)
1985	397.6	739.1	1.9
1990	686.3	1510.2	2.2
1993	921.6	2577.4	2.7
1995	1577.7	4283.0	2.7
2000	2253.4	6280.0	2.8
2001	2366.4	6859.6	2.9
2002	2475.6	7702.8	3.11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3[M].有关数据整理,中国统计出版社。

表2 中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较

年份	绝对数(元)		(2)/(1)
	农村居民(1)	城镇居民(2)	
1985	347	802	2.3
1990	571	1686	3.0
1995	1434	4874	3.4
1997	1876	5796	3.1
1998	1895	6217	3.3
1999	1927	6796	3.5
2000	2037	7402	3.6
2001	2156	7761	3.6
2002	2259	7972	3.5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3[M].有关数据整理,中国统计出版社。

人口只占3亿,但从表2看,中国城乡消费水平之比2002年为3.5:1,也就是说3个半农村人口的消费水平只相当于1个城市人口,足见我国城乡的消费水平呈现严重不均的状态。尽管国家大力提倡提高农民收入,并采取了减轻农民负担等一些措施,但农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仍提高缓慢。这集中表现在城市已经饱和的许多耐用消费品,在农村的普及率却相当低。例如:2002年底,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照相机、空调机和移动电话拥有量

分别只有60.45、14.83、31.8、3.34、2.39和40.77,仅仅相当于城镇80年代中期的水平,落后了将近20年。许多在城镇逐渐普及的新型耐用消费品如影碟机、录像机、摄像机、淋浴热水器、排油烟机、微波炉、钢琴、空调器、家用电脑等在农村也几乎是一片空白。以不同人群收入的百分比份额指标来衡量,我国目前收入分配不均的严重程度已经高于全部发达国家、一般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

农民收入偏低造成的农民相对贫困和农业经

济的相对落后,成为“三农”最突出的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国农业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我国长期存在的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造成农村消费水平严重偏低,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别很大,农民低水平的收入导致其在低层次上生存,这种非良性循环的不断重复,使“三农”问题难以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城乡之间收入悬殊,同时收入分配不均也是影响我国整体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原因。

(二)城乡隔离模式是造成农民收入水平偏低的主要原因

由于旧中国历史遗留因素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的工业化是以城市为基地实施的,加上实行城乡隔离的户籍、劳动就业和福利制度,我国逐步形成了相对落后的农村和传统农业与相对发达的城市和现代化工业同时并存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采取了一些促进农业、农村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的措施,如提高农产品价格、逐步减免农业税等,农业、农村和农民受歧视的状况有所改观。但由于传统城乡隔离、重视城市、轻视农村的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农村和农民问题并没有得到较大程度的解决。尤其是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大量农民被束缚在农村狭小的空间,城市化水平非常低。

城乡隔离模式把大量农民束缚在狭小的土地上,农民收入问题在这种模式中不可能大幅度提高。其原因在于:

1. 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使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按照边际收益递减理论,当其他生产要素投入量不变,某种生产要素投入量超过特定限度后,其边际产量随其投入量的增加而递减。亦即:

设生产要素 X_i 的投入量为 x_i , 特定限度数量为 \bar{x}_i , X_i 的边际产量 MP_i 在其他生产要素投入量不变条件下,当 $x_i > \bar{x}_i$ 时

$$\frac{\partial}{\partial x_i} MP_i < 0$$

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在传统农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土地等资源投入量固定不变,即使增加再多的农业生产劳动力,农产品的产量也不会有很大提高,最终造成农业经济增长较为缓慢。这一规律在农业技术进步缓慢的发展中国家表现得尤为明

显。据统计,在1965—2000年,世界各类国家农业的增长都低于工业和服务业的增长,非农产业的增长速度都在农业增长速度的2倍以上。我国的农业经济增长也表现出了同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同样的规律。农业增长缓慢决定了农民收入增长不可能很快,农业和非农产业增长的差距也将会使农民和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而如果走农村城市化道路,就能够集中同样数目的劳动、资本,使各种资源得到合理的空间布局,在同样的技术条件下,既能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又能提高农产品的质量,促进农业经济的稳步增长。

2. 农产品需求缺乏弹性使农业产业增产不增收

如果 R 、 R_M 、 X_p 、 Q 分别表示总收入、边际收入、价格和产品数量,则有:

$$R_M = \frac{d(X_p \cdot Q)}{dQ} = X_p \left[1 + \frac{Q}{X_p} \cdot \frac{dX_p}{dQ} \right] \\ = X_p \left[1 + \frac{1}{\epsilon} \right]$$

故当 $|\epsilon| < 1$ 时, $R_M < Q$ $|\epsilon| > 1$ 时, $R_M > Q$

按照收入弹性理论,当产品需求有弹性 ($|\epsilon| > 1$) 时,供给增加使总收入随之增加;当产品需求无弹性 ($|\epsilon| < 1$) 时,供给增加反而使总收入减少。目前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对农产品产量增长的平均弹性已明显下降,1978—1984年平均为2.05,1985—1990年平均为0.82,1991—1998年平均为0.65,1998—2003年平均为0.56。这就是说,在目前的经济状态下,农产品产量每增长1%,所能带动的农民收入增速要远小于1%。可以预计,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随着农产品以及整个经济供求关系的持续改善,产量增加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带动作用将继续减小。

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也验证了这个结论。当一个国家进入了稳定收入阶段以后,国内对食物的需求增长速度就会下降,但同时扩大食物生产的能力却在继续提高,因为发展完备的农业研究基础设施能产生迅速的技术变革。在食物需求价格弹性较低的情况下,需求变化相对于供给变化的滞后将导致农业价格和收入的急剧下降,并制约农业经济的发展。而脱离传统的农业

经济靠自身拉动增长的模式，选择城市化模式解决农业问题将是未来必然发展的趋势。据农业部最新调查结果显示，我国飞速增长的农民工所寄回的钱款大有取代农业而成为农村第一大收入来源的趋势。我国 2003 年大约有 9 800 万农村居民远离家乡在外工作，在当年总共寄回或带回家 3 700 亿元人民币，比 2002 年增长了 8.5%。调查还显示，农民工的汇款在推动农村经济增长方面的贡献超过了中央和地方政府所注入的任何一笔资金，可见城市化对农村经济的巨大拉动作用。

由此看出，依靠农业自身经济增长解决农民收入问题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我国现阶段正确解决“三农”问题中农民收入偏低的有效手段就是走农村城市化的道路。

二、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选择和过程

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城市化严重滞后，是我国农民增收难的深层次原因。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城市化是持续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

我国“三农”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大量减少农民的数量。要实现这一点，惟有靠实现城市化战略才能最终完成。农村城市化是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全面小康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在以“集成经济”为显著特征的知识经济社会，一切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都以城市为中心，城市化提供了信息和交流的基础及知识共享的环境，作为知识经济增长的源泉，城市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表现在：1. 科学的农村城市化规模能够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而实现机械化与规模经营必须把多余的劳动力转移出去，这关键还是要走农村城市化之路。2. 合理的农村城市化建设进程，可以在农业经济增长缓慢的情况下迅速提高农民收入。由于农业生产规律决定了农业的增长注定缓慢，在农民总收入不能迅速增长的情况下，通过农村城市化来减少农民的人数，就可以较为迅速地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3. 城市化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避免陷入“马尔萨斯陷阱”的必由之路。我国经济增长中存在着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尽管我国经济增长很快，但人口的增长也

较快，如果农村人口持续增长不能有效地加以解决，一旦经济增长进入低速期，就有可能陷入“马尔萨斯陷阱”，导致国民经济的低水平均衡，人均收入增长缓慢，国民经济的增长也因此受到限制。既然在城乡隔离的条件下无法有效地控制农村的人口增长，那么，打破城乡隔离的障碍，通过城市化改变农民的身份和生育的成本—收益结构，从而解决农村人口过剩问题。当然这也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一个基础条件。

(一) 农村城市化能够获得农业生产函数的规模收益递增

规模收益是指当全部生产要素投入量同时按相同比例增加时产量变动的情况。给定 α 次齐次生产函数：

$$q = f(x_1, x_2)$$

其中， q 为产量， x_1 和 x_2 为两种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对于任意正实数 λ 有：

$$f(\lambda x_1, \lambda x_2) = \lambda^\alpha f(x_1, x_2) = \lambda^\alpha q$$

当两种生产要素投入量同时扩大 λ 倍时，产量则扩大 λ^α 倍。如果 $\alpha > 1$ ，则规模收益递增。如果 $\alpha < 1$ ，则规模收益递减。

欠发达国家的人均农业产量的增长缓慢，人口增长和非农业部门对劳动力吸收能力也不足，常常出现农业劳动力绝对增加而拥有的土地面积持续下降的情况。伴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不断减缓，就会产生农业生产部门规模收益出现递减的情况，即 $\alpha < 1$ 。而如果通过不断加快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工业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新知识的应用等则将产生收益递增的规模效应，降低劳动成本，实现经济高效、稳步增长态势。城市化通过成本优势、网络效应，可以获得农业规模收益的递增，出现 $\alpha > 1$ 的情况，在农民总收入不能迅速增长的情况下，通过城市化来减少农民的人数，就可以较为迅速地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

发达国家城市化的实践也表明，城市在社会进步中起着主导作用。工业同农业的区别就在于它的集中布局性，即对积聚效应的要求很高。任何一家工厂都需要一定的基础设施，都需要有相配套的上游和下游企业，以相互提高供给和需求。从社会发展历史看，工业的发展必然伴随着人与物密集的城市崛起。城市是工业和工业文明的载体，没有城市就不可能有工业的大规模发展，世界各国的工业发展的实践几乎都是以城市

为依托的。

(二) 城市化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推进器

在工业化进程中,新增就业岗位主要是由城市经济创造出来的。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活力的体现恰恰是大中型中心城市的规模扩张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城市建设加速和城市经济的活跃。实践表明,大中型中心城市先于小城镇、小城市而出现加速扩张是一个符合客观规律的必然结果。在现代社会经济系统中,没有大中城市的分工组织作用,就不会为新转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因此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大中型城市的发展及农村城市化不仅仍将是国民经济保持较快增长速度的最重要支持力量之一,而且也是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的推进器。

欠发达国家农业增长有两个必要的条件:一是土地节约和劳动技术的开发与扩散;另一个就是非农业部门就业的快速增长。一旦非农业部门劳动力就业充分扩张,吸引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就会对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收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现代机械技术的引进也进一步强化了大规模经营相对于小规模效率优势,从而使大资本的农场能够迫使农民从其土地上脱离出来并成为无地的劳动者。由于现代化农业技术具有节约劳动力的作用,使一些劳动者无法在农村就业,只能迁移并加入到城市游民的行列或作为产业后备军的补充。因此城市化自然成为实现第二个必要条件的必然过程。因而实施农村城市化战略,促进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共同繁荣共同富裕是解决“三农”问题和实现全面小康的必然选择。

(三) 农村城市化符合科学的经济发展新观

经济发展的基础首先是农业人口向城市大规模的迁移。工业革命的发生是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而成。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农村出现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外流情况造成的。随着人口压力的不断增大,资源有限的土地无法养活全部农业人口,为此人们想尽办法提高农业生产力,随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农村出现了无法避免的劳动力外流的局面,如果对这些剩余劳动力不加以适当的疏导,就可能阻碍经济发展。

150年前的欧洲、美国以及紧随其后的日本都经历过由村镇农业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的过渡,这种过渡的关键和基础就是通过农业人口向

城市的流动,进而引发社会结构的根本性改变。当今的富裕国家最初是农业国,依靠技术进步和经历农业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最后才成为城市化的工业国。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也证明,正是城市的服务部门吸收了从农业部门和制造部门源源不断释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为提高农民收入创造了良好的基础环境,所有试图人为地限制农村人口外流,改变上述逻辑的国家都难逃失败。因此城市化道路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经之路。截止到2004年底,世界高收入国家城市化率平均为78%,中等收入国家为64%,低收入国家为30%,我国的城市化率仅达到40%,因此加大农村城市化的进程,才可以使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快步赶上世界发达国家。

推动经济增长和建设小康社会是发展经济学一直关注的问题,城市化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起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随着信息化和知识经济的兴起,城市化可以使产业获得巨大的聚集经济效益,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往往是与城市化相伴而行,城市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实现农村城市化的建议和对策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把一个低水平的小康社会建设成为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的第一层含义就是全面发展城乡经济,实现城乡经济的共同繁荣和共同富裕,这就决定了必须走农村城市化道路,因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是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农村问题解决得如何,最终必将会影响到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质量。因此,解决好“三农”问题不仅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前提,而且是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

我国的城市化路径和模式选择应形成以省会城市、中心城市为基础的产业带城市化,实现区域内、外互动的城市化氛围,这是因为大工业是城市化最有效的物质技术方面的动力源泉。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看,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制造业来促进和发展的。制造业是一个具有很大经济扩大效果的部门,只有制造部门才能创造上百万的必要的就业机会,才能吸收来自农业部门的更多的剩余劳动力,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

经济增长还是要依靠扩大制造业部门的手段。目前我国农村生产率低和乡村贫困化升高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收入被不断压低,因此对于政府来说,其目标应该是通过提供就业机会及更高的生活质量解决所有人民的问题,做到这点恐怕就需要实现均衡增长。虽然均衡增长和部门增长都能够带来总体增长,但就我国情况来说制造业将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其他产业的增长仅仅是一个小的部门增长。对于我国来说解决“三农”问题没有什么新的道路可走,只有将大量剩余劳动力吸收进制造业和服务性行业中来,才能彻底解决“三农”问题。

同时,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还要依靠制度上的变革。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西方工业文明冲击下启动的,这就使我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更加凸显。现代化的一个突出反作用就是全球范围内占主导地位的财富创造模式严重影响了农村地区人口的经济状况。财富创造的新模式造成了农村地区生产成本的提高,致使农民遭到排斥,大量从事第一产业并以此为生的农民面临着成本提高、遇到问题无法用现代化成果加以解决,农民的基本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同时新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使农村人口很难融入高科技以及高附加值的经济领域。如果基本制度不改变,这种“低水平、不全面、不平衡”的格局仅依靠一些弥补措施不可能在根本意义上起作用。城市化实则为解决农村问题提供了一个制度性的保障。只有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景才会更加乐观。

制度的变革对于“三农”问题的解决也起着关键的作用。从十六大报告对现阶段我国的“低水平、不全面、不平衡”的进一步阐述看,许多方面的变革实际上必须依赖于制度的变革和完善,也就是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改变必须要

求户籍制度的变革。在现有的户籍制度下,只依靠各地区鼓励农民进城居住、或改变所属区划等措施,虽然在统计意义上提高了城镇化率,但依然无法消除根本性的“二元”格局。只有当这一制度发生根本变革后,才会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让农民在政治上获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平等地位,逐步取消户籍控制,允许农民自由流动,到城市寻找就业机会;让农民在经济上获得比农村较高的城市经济收入,以调动农民的个人才能的积极性,并在制度上保证给予个人发挥能力的条件和机会;在生活上能享有城市丰富多彩的生活和各项社会保障;政府的城市化方针要与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相结合,正确处理城市化进程中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的关系。

城市化的进程同时还包含着城镇规划和开发进程,实现这项综合性任务要把许多要素通盘考虑进去,如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我国产业结构特点、环境承受能力、纳入地区发展规则的情况以及本地区服务业领域的融资可能性等。

[参考文献]

- [1] 辜胜阻. 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 [M].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35—38
- [2] 速水佑次郎等. 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89—95
- [3] 中国统计年鉴 [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3. 167—173
- [4] 程怀儒. 论中国传统农业想现代化农业的转变 [J]. 经济学动态, 2004 (12): 62—64
- [5] 樊小钢. 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保障制度创新 [J]. 经济学动态, 2004 (3): 45—47.

[责任编辑 李新伟]